

齐鲁文化学术文库

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



王震中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ZHONGGUO
GUDAIWENMINGDE
TANS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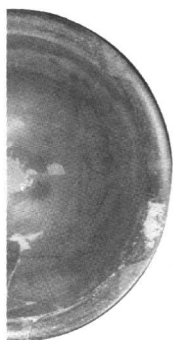
齐鲁文化学术文库

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



王震中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ZHONGGUO
GUDAIWENMINGDE
TANSUO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王震中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10

ISBN 7-222-04472-8

I. 中... II. 王... III. 文化史—中国—古代—文集
IV. K2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6804 号

责任编辑: 张 波

装帧设计: 杨晓东 孟嘉福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
作 者	王震中 著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peoplespace.net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415 千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排 版	昆明五彩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7-222-04472-8
定 价	42.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作者简介

王震中

1957 年生于陕西省榆林市。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校外专职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会委员。著有《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合著）、《民族与文化》（合著）、《国际汉学漫步》（合著）、《先商文化与商代都邑》等。

前 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学术文集汇集了我 1984 年底硕士生毕业以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与上古历史文化方面的部分论文，其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是近期的新作。无论是旧作还是新作都作了些修订，特别是对文中的注释，有的以“补注”的形式作了增添，有的则作了删改。

文集分为两编，上编“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可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即 1994 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一书相互参阅。如果说在拙著《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中我曾提出了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过程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此为杨升南先生对拙著的概括，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 年第 5 期），那么，在本文集的《从邦国到王国再到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等篇中，我又提出了进入初始国家以后的中国古代国家演进的三个阶段与三种形态：邦国—王国—帝国。若仿照杨先生的语言，这后一种观点可否称之为“古代国家三形态演进说”？显然，作为文明与国家起源过程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与作为国家形态发展过程的“古代国家三形态演进说”，二者是衔接的，也构成了一个系统，可谓一家之言。我对二者的研究也只是刚刚开始，特别是对后者甚至只能说是问题的提出，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还需假以时日，在这里我之所以特别加以提出，是期望或许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文集下的下编“族落文化与宗教崇拜”，汇集了十二篇有关族落文化与宗教崇拜方面的文章。鉴于文明的内涵是丰富多彩

的，它既包含文化意义上的文明，也包含社会意义上的文明，因而将族落文化与宗教的内容放在本文集中，与文集的书名是相符的。在族落文化方面，既有单纯的纯文献方面的考证，如《共工氏主要活动地区考辨》《帝喾并非商之始祖》，更多的则是考古与文献相结合进行的论述，如《东夷的史前史及其灿烂文化》《夏商周文化中的东方渊源》《略论“中原龙山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等。在宗教崇拜方面，主要是将考古与文献乃至甲骨文相结合做的研究。

下编诸篇所探讨的问题，即使今天看来也是很有意思的。如史前的红山文化女神庙和祭坛等遗迹发现后，学术界对它们的研究和见解可谓见仁见智，我在《东山嘴原始祭坛与中国古代的社崇拜》一文中，通过对出土物的分析与文献的结合，提出东山嘴大型方形祭坛及其中间所立的一大堆长条石头是祭社遗址，所祭祀的对象是石社，并把由原始社会后期至汉代以来的社崇拜划分为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次生形态三个阶段，分别予以论述。近年随着河南偃师商城一些重要发现见诸于报道，学术界对偃师商城内是否有“社”以及是否如《考工记》所言呈“左祖右社”的布局，甚感兴趣。为此，作为本文集的新作《商代王都的“社”与“左祖右社”之管见》一文，在考察了早商和晚商的王都遗址中可能与“社”有关的遗迹后，结合甲骨文与文献，认为商代有社，但不呈“左祖右社”的布局，其原因在于商人对社的崇拜还处于原生形态的阶段，社神还未上升到与祖神并列的地位；在商代的甲骨文中，虽然既可以看到单独祭祀社的卜辞，也可以看到社与河、岳等一同被祭祀的卜辞，还可以看到社与祖先一同被祭祀的卜辞，但社神的地位大致与河、岳等相同，无论从祭品的种类和数量，还是从受祭的频繁程度等来看，社神的地位远低于祖神的地位，周代用于祭社的一些做法在商代是用于祭祀祖先神的。周代的人们在社的土地神的自然属性中加进了与农业

生产无关的许多社会属性，社神的地位大大上升，“社稷”一词也成为国家的代名词，社神与祖神并列，因而在宗庙与社的布局中才呈“左祖右社”的格局，但这已属社崇拜的次生形态。这两篇文章联系起来即构成一个系统，意在说明中国古代文明在不同阶段对社的崇拜有不同的特色。

再如图腾与始祖诞生神话方面，记得2003年我在杭州参加良渚文化学术研讨会，将刚刚发表的拙著《试论商代“虎食人卣”类铜器题材的含义》一文送给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著名考古学家牟永抗先生时，他即向我提出很希望我能专就图腾问题写一篇文章，他很看重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本文集中的《图腾与龙》对于图腾的起源、图腾的转型、龙的原型究竟是什么、龙与图腾究竟是什么关系、后来作为皇权象征的龙的形象能否作为今日中国的象征、在龙的文化中究竟体现了什么样的心理素质和结构等，提出了我自己的解答。在《试论商代“虎食人卣”类铜器题材的含义》一文中，将商代人虎相结合的、人在虎口或两虎口中的铜器纹样或造型，与中美洲奥尔梅克等文化中的人虎或人兽组合、人头在虎嘴或兽嘴中的题材和传说对比后，提出商代的这一题材起源于商代虎方方国的部族诞生神话，虎口中的人并非表示人被虎吞噬，它表示的是该族的人来源于虎，是其部族诞生神话故事的一种反映；至于虎方地域之外的人虎组合纹饰，则是从虎方传播而至的、文化交往的产物，属于交往双方统治阶层的精神、宗教领域的沟通，其中殷墟的出土物虽属殷王室自铸自用，但这一纹饰的理念来自于虎方，殷商王室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把虎方的族神纳入殷的祭祀系统，并以此作为维系对虎方方国支配的一种手段。此外，《帝喾并非商之始祖》一文也涉及到商族的原生形态的始祖诞生神话与图腾的关系的问题。所以，这三篇文章也可构成一个系统，从中可以看到我对文化人类学上的图腾崇拜，对中国新石器时代乃至商代已属转型变化了的图腾问题，

是加以区别的，这就要求我们应该意识到，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一些文化现象即使与图腾有关系，也是有转型与变化的，因而对其做出的解释，应该是在图腾理论的基础上依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加以创新，而不是套用一下图腾理论那么简单。

还有，在族落文化方面，本文集的《东夷的史前史及其灿烂文化》是把族落文化与地域文化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的。它原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中的一个章节，发表后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青年优秀成果论文一等奖。因为族落是有迁徙的，所以在将族落文化与地域文化结合在一起加以研究时，情况是相当复杂的。然而在海岱地区，我们看到史前乃至夏商时期，尽管有一部分东夷族的迁出，也有其他族的迁入，但以东夷族为主体，作为族落的整体还是稳定的，而山东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掘与研究表明，这一区域的文化在总体上是连续而有序的，所以，将族落文化与地域文化相结合，在山东地区是最有条件的。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中国文化是灿烂多彩的，而她又是由各地域文化所构成，所以对中国文明的研究必然要走向对中国各地域文明与文化的深入研究，有了这一过程和经历后，回过头来再看中国文明，认识将会更加深刻而丰富多彩。最近在和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王志民教授有关齐鲁文化研究的几次畅谈中，发现在这方面大家是有许多共识的。由于王校长亲自兼任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使得该中心这几年在展开齐鲁文化的诸多领域的研究方面，真可谓硕果累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巍先生的努力下，近几年来坚持举办一个一个地域文明化进程的研讨会，并以此推动各地域文明起源和其早期文明特点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因此，将族落文化与地域文化有前提有条件地加以结合，并进行辩证分析，应该是深化古代文明研究的一个方面。

本文集中的《甲骨文亳邑新探》《商代周初管邑新考》等篇

是我近年来商代都邑文明研究课题中的部分收获。商汤所居之亳究竟在何地，是学术界聚讼纷纭的一大难题。然而甲骨文中有所谓亳，而且在征人方的卜辞中，亳地距离商地仅有步行一日路程的距离，因而欲解决甲骨文中的亳在何地，关键是考实此商地究竟在何处。要确定商在何地，一是需将卜辞的“商”与“大邑商”和“中商”放在一起加以全面系统的考察；另一是需辨析那些记录有“十祀”即帝辛十年告庙于“大邑商”的征人方卜辞，与并无“十祀”记录的“在商贞今日步于亳”之类的征人方卜辞，是否都是一次征人方战役中的卜辞，即是否都是帝辛十年征人方的卜辞。根据商代《小臣艮犀尊》铭文，还有“十五祀”即帝辛十五年征人方的战役，日本学者岛邦男在《殷墟卜辞研究》中曾排出帝辛八祀征人方的历谱。若帝辛十祀告庙于“大邑商”的征人方卜辞与并无十祀记录的“在商贞今日步于亳”之类的征人方卜辞，并非为同一次战役，那么，结合对“大邑商”“中商”与“商”的系统考察，“大邑商”“中商”与“商”三者无论是在天下之中央的意义上还是在具体的地理位置的层面上，都实为一地，即都可以指称商都安阳。因此距离商地仅有步行一日路程的亳地，也就应该是《吕氏春秋》所说的成汤灭夏前作为其根基的“鄩薄（亳）”，此地在今安阳东边的内黄或其附近一带，特别是内黄靠近濮阳的地方。此即成汤灭夏之前所居之亳，也是甲骨文中唯一的亳。由于在甲骨文中并无“三亳”并存的情形，所以应该说，灭夏后商王虽然先后在偃师和郑州修建了王都，并使用到仲丁之前，但商汤并没有把亳名带到偃师和郑州。由于问题比较复杂，所以刊载于《历史研究》上的这篇文章写得较长，但它或许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供学界参考。自郑亳说提出以来，郑州一带是亳地还是周武王封其弟叔鲜于管之管地，也为学界所关注。传统的说法是作为三监之一的管叔所封之管在郑州市或其附近一带。本文集中的《商代周初管邑新考》依

据《逸周书·作雒解》“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帝王世纪》“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以及《作雒解》说周公征讨叛乱的三监等国时“临卫攻殷”等记载，再结合甲骨文中的“东”地和“卫”地都可将其考证在商都安阳以东的情况，提出商代的管邑和周初作为三监之一管叔所封之管，不在郑州一带，而在商的朝歌以东商代卫地范围的濮阳一带，这一带有被称为“管”的地名，也有被称为“东”的地名，还有被称为“卫”的地名。后来，周公平定三监之乱、管叔被杀之后，管叔的后裔迁到郑州一带，才将管的地名带到了郑州或其附近。我以为我的这一新考是对以往《逸周书》“建管叔于东”未作深究的最合理的解释。

总之，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既应作理论上的思考和创新，也应以相应的具体的研究为基础。在具体研究中对各地的地域文明和文明内涵的各个方面又应该有所兼顾。本文集所选论文的标准也以此为宗旨。诚然，研究和论述得究竟怎样，还有待方家的批评指正。

最后，在这本论文集即将出版之际，我要特别感谢云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小燕女士对本书的出版所给予的大力支持。记得自1997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李学勤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以来，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与王小燕副总编辑就建立了友谊和良好的合作关系。该书由我们先秦史研究室的五位研究人员集体撰写，我是其中的主要作者之一，那时王小燕女士还是云南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部的主任、编审，当时她为了高质量地出版那本书，不辞辛苦，奔波于云南、北京乃至深圳之间。自那以后，她为组织出版学术著作，经常来往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我们历史研究所。可以说，本书是她多年来一直给予我们这些作者热情关怀和帮助的又一体现。此外，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张波女士，为了此书出版付

前 言

出了大量辛劳，悉心审阅，纠谬订讹，其责任心和认真的态度，难能可贵。在此，我对云南人民出版社，对王小燕副总编辑、张波编辑，表示深切的谢意。

目 录

前 言	(1)
-----------	-------

上编 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2)
从符号到文字	
——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探讨	(50)
试论陶文“  ”“  ”与“大火”星及火正	(103)
文明与国家	
——东夷民族的文明起源	(120)
祭祀、战争与国家	(133)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国家的形成	
——从聚落到国家	(157)
良渚文明研究	(187)
先商社会形态的演进	(218)
西周城邑国家文明的起源	(254)
从邦国到王国再到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	(265)

下编 部落文化与宗教崇拜

共工氏主要活动地区考辨	(276)
东夷的史前史及其灿烂文化	(287)

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

夏商周文化中的东方渊源	(308)
略论“中原龙山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319)
东山嘴原始祭坛与中国古代的社崇拜	(353)
图腾与龙	(369)
试论商代“虎食人卣”类铜器题材的含义	(394)
帝喾并非商之始祖	(412)
甲骨文亳邑新探	(422)
商代周初管邑新考	(465)
商代王都的“社”与“左祖右社”之管见	(475)
应该怎样研究上古的神话与历史 ——评《诸神的起源》	(498)
后 记	(522)

上 编

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一 文明起源研究既是理论问题 亦是考古学的实践问题

重建过去是历史学者的任务，但在今天看来，重建上古社会的历史就不仅仅是历史学家所能完成的，它至少需要与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相结合。诚然，中国人历来以自己有悠久而连续不断的历史和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而感到自豪，也以有丰富的史书、浩瀚的典籍和发达的史学而举世瞩目。在传统史学中，中国的历史自三皇五帝开始，一直是清楚的；中国的第一部以纪传体为体裁的通史性的历史巨著《史记》，也是从《五帝本纪》开始的，五帝中的首位是黄帝，后来的人称黄帝为华夏族的人文始祖；也就是说在传统史学中，我们今日称之为“文明”的中国历史的起源至少从黄帝开始是可以讲清楚的。然而，进入近代以来，在西方科学思想和实证史学的影响下，在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民主科学精神空前高涨的氛围中，儒学和经典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怀疑和动摇，以顾颉刚为核心的疑古辨伪学派（亦称为古史辨派）应运而兴起，他们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为辨伪的理论核心，彻底否定了“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中国史学界乃至国际汉学界有过广泛的影响。

古史辨派研究的对象，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传统性的中国古代的史料，对此加以严密的文献辨析。其业绩主要是在文献上

证明古籍中的古史传说是如何通过战国、秦汉及其以后的政治学说影响而发生变形的，所关心的主要是经书本身，注意力主要在于其神话被文献化、被观念化、被变形的过程。

学术是时代的产物，必然也会带有时代的局限性。说到古史辨派的局限性，日本著名学者贝塚茂树先生曾指出，神话传说，作为时间性的变化系列来考虑，“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和“加上说”^①的假说都是很有说服力的，但被文献化的神话传说的变

① “加上说”原出于日本江户时代大阪町人学者富永仲基的《出定后语》一书，这是日本著名佛学史研究著作，出版于1744年。“出定”，佛语，指僧人禅定结束后走出坐禅场。此书在研究原始佛教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指出：佛教的前身婆罗门教是主张从地上的苦界中摆脱出来而转入天国的思想的，所以天国是一个相对于地上人间的理想王国，这个“天”原来只有一个，但后起的婆罗门新宗派，为了胜过旧有的宗派，把自己宗教中的天国放在原有宗教的天国之上，认为新宗教的崇拜者可以转世到比原来的天国更新更好的天国中去，这样，“天”上便重叠了一重“天”。后来不断出现的新宗教，都这样不断地往原有的“天”上叠加“天”，终至于婆罗门教的天国有二十八重、三十三重之多。富永仲基把这种现象称为宗教起源上的“加上原则”。富永仲基的这一“加上说”是通过内藤湖南的推崇而影响于日本的汉学界的。内藤湖南早年热心于日本佛教人物和典籍研究，十分崇拜富永仲基的学说。1925年内藤作《大阪的町人学者富永仲基》之讲演，首次较全面地介绍了富永其人其学，其中有专节述及“加上说”。他称赞“加上说”是“非常伟大的学说”，是“一种从思想的积累上来思考问题、根据思想的发展来发现历史的前后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研究没有历史纪录的时代的史，是再好不过的方法”。而且，内藤还介绍了富永在汉学研究中对这一方法的运用，他概括富永的观点是：“孔子生时，正值春秋五霸鼎盛时期，齐桓晋文为当时最强大的霸主。在此霸者极盛之时，孔子鉴于当时人人尊霸的现象，便在此上‘加上’，倡言文武，于是周文王、周武王之说出。孔子之后，墨家兴起，墨家在文武之上更说尧舜，此后又有杨朱在此之上又说黄帝，再后《孟子》书中的许行又在此之上说神农。这就是支那史上的加上说”（内藤湖南：《大阪的町人学者富永仲基》，《内藤湖南全集》第9卷，筑摩书房，1970年）。

可见，日本富永仲基的“加上说”与中国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是很相似的。但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说”的提出并非受内藤湖南的影响。因为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是在1923年5月《努力周刊》增刊《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正式提出的，它比内藤湖南1925年所作的《大阪的町人学者富永仲基》之讲演要早两年。“加上说”和“层累地造成说”是日中两国学者分别独立得出的〔以上参见钱婉约：《“层累地造成说”与“加上原则”——中日近代史学上之古史辨伪理论》，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1999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化，并不是单纯的时间性的问题，空间性和地域性的差异也应考虑进去。应该意识到其变化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其中，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保持了不同的神话传说。神话传说相互间的矛盾是有原因的，有某些史实的反映，不能把相互矛盾的传说作为后世的伪作之史而加以排除。而“层累地造成说”本身只是考虑时间上的变化，这终究是一个根本性的欠缺。^①

作为辨伪的理论观或假说的表述，“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确实有只是考虑时间上的变化，而没有反映出空间性及地域性的问题。但在实际的研究中，顾先生的《九州之戎与戎禹》等论文，是充分考虑了古史传说的空间性与地域性的，而顾先生本人也提出过“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四个打破”中的前两个打破，显然可以视为是对古史传说研究中空间性与地域性问题的补充。

古史辨派的第二个局限是，在上述顾先生的“四打破”中，“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今天看来，似乎过分绝对。在古史和神话传说中，确实存在由纯粹的“神”而人格化、历史化为“人”，即古史人化的问题。但在远古“原逻辑”^②的思维下，那些强有力的部落酋长和部落英雄，在其活着的时候就有可能被视为具有神力或神性，成为半人半神者，其死后变为部落神，其神性被不断地加以强化，并在部落中或部落间广泛流传，这都是有可能的。这样，在神话传说的历史化、文献化过程中，有一部分被人化为人或半人半神的所谓神，原本可能就是远古部落中的酋长或英雄，亦即经历了：远古时为活着的部落酋长（系人，但具有神

① 贝塚茂树：《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序论》，东京弘文堂，1946年初版；中央公论社，1986年再版。

② 参见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